

·门外弹乐·

评奖何处觅“公正”

□梅明蕾

近期古典音乐比赛频频,仅钢琴和小提琴就有利兹、布索尼、克利夫兰、李斯特和伊丽莎白、哈哈图良等国际大赛,此外还有指挥、四重奏、乐器等国际比赛,似乎有意为平时流量不彰的古典音乐注入更多热度。

有比赛就会有评奖(比)。评奖(比)有难易,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说白了就是有些比赛标准唯一,选手比试完毕评委基本可立判高下;有些比赛标准复杂,价值多元,不从多方面考虑作出综合评判,恐难分出优劣。古典音乐比赛评奖显然属于后者。

最近第二十届伊丽莎白王后国际小提琴比赛刚刚落下帷幕,评奖结果立马在网上引发热议,争议的焦点,是对获得首名的乌克兰选手迪米特罗·乌德维琴科与获得第四名的华人小提琴家朱凯源排名的质疑。不少乐迷以为,朱凯源能力和现场表现都大大超过乌德维琴科,小朱的排名却大大落后于小乌,评奖的公正性从何说起?

知名乐评人苏立华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直言:最后进入决赛的12位选手中,美国小提琴家朱凯源(Kevin Zhu)远远优于其他11位选手,“在小提琴演奏的技术层面上,朱凯源就是当今年轻一代小提琴演奏界的李小龙,他左右手的技术都达到了近乎完美和自由的境界”。从艺术上看,朱的人文和音乐素养也“非常高级”“优质”。

至于苏立华对于获首名的乌德维琴科演奏曲目的具体评价,限于专业性过强,此不赘言。他倒是认真细听了小朱与小乌数轮比赛演奏,然后一一作出点评和比较,粗略结论,虽然二人均非完美,但无论是技术把控还是音乐表现,小朱都比小乌高出一大截。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网上会有那么多人“为朱凯源打抱不平”。

·序跋集·

“天字一号”龙门石窟

□温玉成

笔者于1964年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在龙门山“昼读古史,夜数繁星”,度过了36年(1964—1999年)面壁研修的岁月。对龙门石窟我是熟悉的,也深怀情感。“天字一号、皇家风范”是龙门石窟有别于其他石窟的最重要特征,但相较之其他石窟(尤其敦煌石窟)的同类工作而言,我们在龙门石窟的宣传力度、宣传高度、宣传趣味等方面做得尚不够。

早在东汉时,洛阳就是国际性的大都会,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汉明帝建造了中国第一座官办寺院白马寺,翻译出了第一部佛经《四十二章经》(公元1世纪)。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龙门石窟开始正式雕造。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到公元534年,洛阳有佛寺1367所。

龙门石窟开凿在坚硬的石灰岩地层中。北魏时期,朝廷就设有“石窟丞”主管其事。仅“宾阳三洞”即用工802366个。唐代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龕”的工程规模巨大,而敦煌莫高窟和云冈石窟均属于砂岩地层,窟龕的规模都相对较小。

龙门石窟有石窟2345个;其中“造像记”2780品,总计达30万字。这些“造像记”所保存的丰富珍贵的第一手史料,也是其他石窟无可比拟的。

从空间上看,龙门石窟的造像者东起朝鲜半岛(新罗国),西至阿富汗(吐火罗国);南起长江流域,北至俄罗斯西伯利亚(突厥国)。从时间上看,龙门石窟自公元493年至公元1610年,共有纪年题记702品(其中北朝纪年189品)。因此,龙门石窟是我国石窟寺(北魏至唐代)分期、断年的标杆。其他石窟则不然,如敦煌莫高窟早期三窟,至今不能确切断年;隋代石窟原来认为有

·无限杂思·

“寅吃卯粮”:从技术到生活

□刘洪波

当我们说到“未来产业”时,我们不会感到构词法的内在矛盾。任何一种实际的产业,要么出现在过去,要么出现在现在;而未来是尚未到来、尚未发生、尚未实现。因为时间未到,未来的一切都没有现实地展开。

然而,今天人们又确实感受到“未来正在发生”,未来似乎已经与现在并置在一起。当今的人们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不得不接触更多的技术产品和技术应用,经历并无论自愿还是被迫地学会运用快速迭代的技术服务来“实现自我”。不会使用手机来生活的人已经基本上被排除在现代消费、支付和及时的公共服务之外,不会运用视频来表达自我的人正在变成事实上的社交失能者,接下来,不会与智能机器共同完成工作的人将被会排挤出职业生活,就像历史上那些不会操作机器的人被生产过程出清一样。

古代社会的未来由巫师、预言家和思想家昭示,无论这些“专家”有什么不同,他们有着共同的指向,他们指示的未来不过是过去或历史上已经出现过的事情再次出现而已,无论悲观预言还是乐观预言都是“往日重现”,区别只是将重现糟糕之事还是美好之事。

现代社会的未来基本上是由实验室研发,科学家发现规律,实验室发展技术;今天在规律中昭示的,明天将在实验室研发出技术,后天会在现实中出现。与古代人的未来想象大不相同的是,现代人的未来是一种开放的、前进的未来,未来是从历史走来,从现在出发,将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无论悲观预言还是乐观预言,都相信未来不是历史的重现。

当下被称为“后现代”“后工业”,社会的时态失去了顺序性,过去、现在、未来并置和乱穿既是文学艺术和娱乐工程的表现形式,一定程度上也是人们的现实观感。未来已不在实验中,或者说,实验室已不是现代时期的预研式实验室,而是作为技术供应环节之一的生产式实验室。实验室不是昭示未来,而是明示立即变现的下一个时点。从实验到生产的时间间隔大幅缩短,新技术一边实验一边在市场上出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开源使用可以说典型地代表了“未来正在发生”,大模型不是在实验室中完善,而是在广泛的

专栏◀



梅明蕾 媒体人, 爱乐者, 读写驳杂。

我虽然对苏式评论的直言不讳、语辞犀利乃至“笔端常带感情”的表达风格不甚认同,却大体赞成苏立华先生有关小朱和小乌综合水准的评价。考虑到音乐表达的复杂性,先将此搁置不论,而仅仅比较相对容易判断二人高下的纯粹技术因素,窃以为小朱胜出小乌应是显而易见;又凭我认真聆赏过小朱的许多演奏,以及他在此前获得过多项国际比赛大奖所积攒的过关斩将丰富经验,即便朱凯源此次获首奖或也说得过去。

我将此看法与几位资深乐友分享,不料他们却另有见地:说乌德维琴科技术有缺系因其起奏时右手发抖,但那不过是紧张所致,而与技术好坏无关,其后不也立马进入佳境了吗?关键是小朱与小乌出自不同的美学传统,前者承继的是被帕尔曼所熏陶出的美国美学传统(小朱是帕尔曼的学生),后者则是从历史中走出的青年演奏家,承继的是渊远流长的乌克兰小提琴演奏传统,二者只有偏爱之分,并无高下之别;况且评委不是聋子,大师云集的评委班子不会如此草率地选出首奖得主,如此等等。

虽然我坚持己见,却也丝毫不敢忽略乐友的看法。文无第一,诚然如此。评委不是聋子,但审美偏好总会有的,打分评奖时也会表现出来;况且从以往的赛事评奖中得知,虽然有回避制度,评委与选手间错综复杂的隐性师承关系也无不影响到评选结果;作为个人的评委资质也并非全然无可质疑。

这样看来,对于比赛评奖完全“公正”的追寻可能永远都在路上,是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



温玉成 龙门石窟研究院名誉院长,这是他新著《龙门石窟——石刻巅峰的前世今生》后记摘编。

120个,后来改称80个。莫高窟不具备分期、断年的条件。

龙门石窟蕴藏的历史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涉及重要历史人物众多(帝王将相、后妃公主、文人墨客等等),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包括中外交流)众多(唐代西行者王玄策、玄照、玄奘、慧超、义净等事迹);这些承载,远非其他石窟可以比拟。

在全国大量的石窟造像中,只有龙门石窟的“宾阳三洞”、奉先寺的“大卢舍那像龕”“摩崖三佛”以及云冈石窟的“昙曜五窟”等十个窟是皇帝主持修造的。由此,产生了佛教造像北魏前期的“云冈模式”,北魏后期的“龙门模式”(秀骨清像),北齐、北周的“面短而艳”以及丰腴为度的“唐代模式”。这些艺术典范,风靡全国。“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唐代文人在敦煌卷子中这样写道:“河洛明月,更照三危。”这是洛阳的皇家典范直接影响敦煌(三危山)艺术的生动写照。

2000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报告中这样定位:“(龙门石窟)代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

而反观云冈石窟,其艺术来源不明,“疑有断层”。昙曜五窟至今不能具体确认。

我们还应指出,龙门石窟艺术作为古代帝王膜拜的圣地,在中国石窟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千峰势到岳边止,万派声归海上消。”龙门石窟以其精湛的艺术成就和大气的皇家风范而成为世界的惟一。



刘洪波 湖北仙桃人。长江日报评论员,高级记者。

现实运用中训练,实验室就是工厂。

正是在未来已经被技术发展拉人到了当下的条件下,“未来产业”几乎顺理成章地出现了。这里,未来所指的是正在出现的下一刻,而不是遥远的将来;产业指的不是成熟的生产,而是边开发边上市,通过把市场使用与实验改进耦合到一起。关于未来的科幻已不在小说家笔下,而是在前沿企业展览中心的“展望”篇章中;已不在文学艺术作品里,而是在触手可及的“概念车”“概念机”上。元宇宙、数字孪生、区块链、量子优势等技术展望与技术实验和正在接近的技术实现几乎是同时展开。这是技术上的“卯粮寅吃”,迫不及待地将来变成现在,实际上是在争相定义未来,从而实现收益最优化、最大化。

人们的生活也被拖进技术的步调,由技术而决断,从而使“未来正在发生”“未来已经到来”成为一种生活感受。子丑寅卯的时间节奏被改变了。“寅吃卯粮”在古代肯定是一种要不得的事情,工业化时代却将“寅吃卯粮”变成了堂堂正正的业务,期货市场、股票市场、借贷市场、保险市场,担保市场、债务市场之所以能够出现,就在于把关于卯时的东西拿到寅时来买卖,把未来的预期和展望拿到“现在”来经营。今天,活跃的风险投资把技术、生产、消费的未来拿到现在来估值,并且发展出“宽容失败”的文化,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债务规模不断突破所谓的“极限”,把明天的钱拿到今天来用成了正常投入。从市场组织来说,“未来已经到来”早已存在,而今天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个人生活层面,信用消费、分期付款、长期贷款也已经普遍化,把未来拿到今天来筹划,把未来提前到今天来实现,不再被视为问题,“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再是现在有多少钱就办多少事,而是展望今后能够有多少钱就在当下办多少事。寅吃卯粮从一个道德问题变成了一个人人生规划的算法问题。一定程度上,寅吃卯粮成了人生进取的动力,普遍的寅吃卯粮甚至成了催生未来稳定预期的力量。

《何以华夏》用文物讲述中华民族故事



近日,《何以华夏:文物

上的中华民族》出版。该书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主任翁淮南教授主编,由国博约30位专家共同参与编写,从国内外近50家博物馆中甄选出200余件陶器、瓷器、青铜器、玉器、刻石、书画、丝织品等不同类型的代表性文物,借文物之口,讲述中华民族历史故事。

“后母戊”鼎、红山文化玉龙、冯承素摹《兰亭集序》卷、各种釉彩大瓶、人面鱼纹彩陶、“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鸡鸣枕、《瑞鹤图》《宋太祖蹴鞠图》、成化斗彩鸡缸杯、唐摹本《女史箴图》……该书挖掘这些耳熟能详文物蕴含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技价值、审美价值、时代价值,生动还原中华民族历史大背景下的武王伐纣、春秋争霸、秦始皇统一中国、丝绸之路、少数民族大融合等一幕幕历史大剧。

书中配有300余张文物高清图、局部细节图、复原图、线条图,以及书画、拓片、壁画等,为读者打造了一场视觉盛宴,比博物馆参观更近距离、更细节、更轻松。

本报在此选载其中若干章节。



《何以华夏:文物上的中华民族》翁淮南 主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快览>>>

《史记里的中国》

赵宗彪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史记》完成了中国人的人格塑造,定位了先秦士人的思想品质,奠定了中国人的精神风骨。本书是读《史记》的随笔集,作者对《史记》烂熟于心,文字非常有特点,老辣生动,入木三分,既是对历史的阐述,也是对现实社会某些现象的批评,很有现实针对性。

《建筑伦理学》

盛可以 著 作家出版社

这不是学术著作,而是实力派女作家盛可以以充满象征意味的全新中篇小说。作品以专业的建筑流程名词划分结构,以女主人公万紫回乡盖房子为线索,刺探复杂的乡村与家庭伦理,揭示个体隐秘的情感与内心世界,富有一定启蒙主义的批判和思考意味。

《金庸评传》

刘国重 著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一代武侠宗师如何练就?无数动人故事从何发端?本书是金庸研究专家刘国重参阅数百种资料撰写的全新金庸传记,从金庸的家世、求学、办报、写作等方面着笔,细致入微地呈现了金庸丰富而传奇的一生;并结合金庸生平,对他如何创作出十五部杰出的武侠小说,做了大量新颖且合理的分析。

1976年3月,陕西省临潼县零口公社(今西安市临潼区零口街道)农民搞水利建设时,于一处周代遗址的窖藏中发现了一件带铭文的青铜簋,因作器者名“利”,故称利簋。让人们震惊的是,利簋上赫然记载了“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直接记述这一历史事件的唯一古文字材料,为人们历时2000多年确认西周代商的时间提供了最为关键的物证。

武王克商和牧野之战是西周代商的重要节点,历来被视为夏商周年代学的关键,由西汉末年的学者刘歆最早开始探索。

确认武王克商(灭商建周)时间之难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传世典籍证据不足。如西周共有多少年?据战国到南北朝时期的文献,如《左传》《孟子》、古本《竹书纪年》《史记·鲁世家》《世经》等记载,西周计年相差200—300余年。

二是学者大多从个人专长或专业出发进行研究。如,西汉末年学者刘歆依据古本《竹书纪年》推算西周建立的时间为公元前1122年,梁启超推算为公元前1027年,天文学家卢景贵提出公元前1046年的观点。

三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研究没有形成合力。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伊始,梳理不同学科对西周代商年代的代表性意见达40余种,最早的是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是公元前1018年,上下相距达112年。

在近年的探索中,诸多科技手段被运用到研究中。如用常规法和AMS法(一种高精度测量放射性同位素比率的技术)对丰镐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地层中采集的系列含碳样品做了碳-14年代测定。同时,还用碳-14年代测定商后期的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系列、西周的琉璃河(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系列和曲村一天马(位于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曲村)系列。专家还对殷墟甲骨文宾组卜辞中5次月食的年代进行认证和计算,得出武王克商年代范围应在公元前1050—公元前1020年。最终,根据利簋铭文中天象的记载,通过对天文的推算,专

2001年7月,考古人员在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跨湖桥遗址发现了一件被丢弃于泥土中且稍有残缺的绳纹小陶釜。釜是一种炊具,通常与支座配合使用,用于煮食烹饪食物。历史上曾有不少关于釜的典故,如“豆在釜中泣”“破釜沉舟”“釜底抽薪”等。

这件陶釜出土时,器内盛有一捆20余根植物茎枝。茎枝长5—8厘米,单根直径0.3—0.8厘米,纹理结节清晰,整齐地曲缩在釜底,茎枝之间杂泥巴,与底腹的接触面也十分清爽。据此观察,推测这捆植物茎枝在被丢弃前就在釜内,丢弃过程中没有散乱,而是紧密地粘连在一起,比较符合茎枝被煮软后的特点。另外,陶釜外壁有烟熏火燎的痕迹,证明曾经过火炊。经浙江省药品检验所中药室检测,植物标本被定为茎枝类。鉴于这些茎枝不可能被直接食用,故应是因陶釜破裂而被丢弃的煎药。至于煎煮的具体是什么草药,已无法进行植物鉴定,所以这8000年前的草药罐里到底装了什么药,目前还是个谜。

在使用化学合成药之前的漫长时间里,人类一直使用天然药物治疗疾病。这些天然药物包括植物药、动物药和矿物药,其中植物药应是人类发现和使用最早的药物。

考古人员曾在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发现了人工采集的樟科植物叶片堆积遗存,而樟科植物有不少是药用的,说明7000年前的先民已经知道这些植物有毒,可食用,或有可能已懂得利用樟科植物驱虫治病。

医学界曾将中药起源的时间定在《黄帝内经》问世的先秦时期,跨湖桥遗址出土的这一陶釜草药罐,

家将武王克商的年代确定在公元前1046年。

簋,流行于我国商代至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用于放置饭食,是古代盛装煮熟的稻、梁等食物的器皿。在商周时期,簋除了作为盛放食物的器皿之外,也是重要的礼器。

利簋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方座长、宽各20.2厘米,重7.95千克,圈足下附方座,双兽首衔鸟头状耳,耳下有垂珥。整件器物上为圆体,下为方体,整体造型表达出“天圆地方”的理念。造型典雅、厚重、庄严、雄伟,其腹部和方座座壁的纹饰以饕餮纹为主,呈现出一种威严与狞厉之美。

利簋的铸造采用先铸造器体或附件,然后将两者接铸的分铸法,较多承袭商代遗风。矿石为孔雀石,燃料为木炭,所用陶埴坩又称“将军盔”,一次能熔铜12.5千克。将熔铜液浇注到事先做好的陶质模腔内,冷却后即可成型。

利簋腹内底部铸有铭文4行,计32字:珷(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贞),克,昏夙又(有)商。辛未,王在管师,锡又(有)事(史)利金,用作檀公室尊彝。

这段铭文的大意是:武王伐商,在甲子这一天凌晨,岁星当空。(战斗到)次日天明,攻下商都。七天之后的辛未日,武王驻扎在阑这个地方,赏赐主知天道的史官“利”(人名)吉金(铜)。利用这些铜铸造了这个簋来纪念祖先檀公。

利簋铭文透出三条重要信息,一是记载了牧野之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印证《尚书·牧誓》等古籍记载,和文献、天文条件等信息契合。

二是专业史官记载了牧野之战。牧野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先发制人的著名战例,也是我国古代车战初期的著名战例。铸造此簋的“利”的职务为“右史”。《左传·哀公元年》和《国语·周语》都曾讲到周人史官主知天道。

三是此簋的主人为“利”。这是目前发现的我国西周时期最早的署名青铜器。利用周王赐的吉金铸造此簋,作为礼器祭祀祖先,说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理念已传承到周朝,并发扬光大。“祀与戎”对后世中国礼乐文明和儒家文化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8000年前的草药罐里装了什么？

加之釜内被鉴定为茎枝类植物的标本,为研究我国中草药,尤其是煎药的起源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

除了草药药,在中华传统医学中,针灸也是较早出现的一种有效的医疗手段。根据先秦时期文献记载及考古实证,研究人员一般把针灸出现的时间定在新石器时代,但其渊源可以上溯至旧石器时代。在跨湖桥遗址中,同草药罐一起出土的,还有疑似用作针灸的钉形器。

针灸由砭石发展而来。砭石可谓我国最古老的医疗器具。最初,砭石主要用于破开脓肿、排除脓血;后来发展为针灸,用之刺激身体的特定部位,以消除或减轻病痛。这些锐利的医疗器具可以用石料、骨头、竹子、木头等制作。跨湖桥遗址中出土了一种钉形骨(木)器,头部尖而不锐、温和柔润,被认为可能是一种原始针灸工具。

春秋时期,已经有擅长针灸的名医。《左传·成公十年》记载了名医医缓于公元前581年为晋景公看病的事例:“疾不可为也。在肱之上,膏之下,攻之(针灸)不可,达之(汤药)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医缓指出晋侯已病入膏肓,无论针灸、用药都无能为力。这是史书所载较早的一份病例。

有意思的是,人们现在常使用的成语“针砭时弊”,意为像医病一样指出社会问题,其中的“针”和“砭”即锐利的医疗器具。

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医针灸”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整理: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清香的日常》

潘向黎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本书分“茶”“诗”“好天气”三辑。作者将学识与妙悟融合,用灵心与文心共振,在喧嚣尘世中寻访一缕茶香,在现代烟火中品味古典风雅,在行走山川中赏读草木人间,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散发着迷人的清香,为行色匆匆的现代人提供了一种慢度日常的生活美学指南。

《笑得出来的养育》

李一诺 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

我们上一次和孩子大笑,是什么时候?我们如何在每一次的养育崩溃中峰回路转?每一个家庭都不一样。这不是一本教你如何养孩子的书,而是一趟邀请父母与作者共度的自我关爱、觉察、疗愈之旅。作者是全球教育探索者,三个孩子的妈妈,畅销书作家。

《文学的一生:阿瑟·米勒自传》

[美]阿瑟·米勒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美国二十世纪戏剧大师阿瑟·米勒唯一的亲笔自传。他以《推销员之死》《萨勒姆的女巫》享誉全球,记录了大萧条时代小人物的梦想和破碎,克制了美国对玛丽莲·梦露的消费,在书中,他对自己所走过的漫长曲折而又丰富多彩的生活和艺术道路做了深沉的回顾和反思,回顾了人生的一些关键时刻。

(整理:长江日报记者李煦)